



增订版

上学记

何兆武 口述

文靖 执笔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对我来说，平生

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

有两度，一次是从初

二到高一这三年，另

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

七年……一九三九年

至一九四六年，我在

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

七年，读过四个系，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是

我一生中最惬意、最

值得怀念的好时光。

上学记

何兆武 口述

文 婧 执笔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增订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学记/何兆武口述;文靖执笔. —增订本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.3
ISBN 978-7-02-011466-5

I. ①上… II. ①何… ②文… III. ①何兆武(1921~)—自传 IV. ①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38021 号

责任编辑 付如初
装帧设计 刘 静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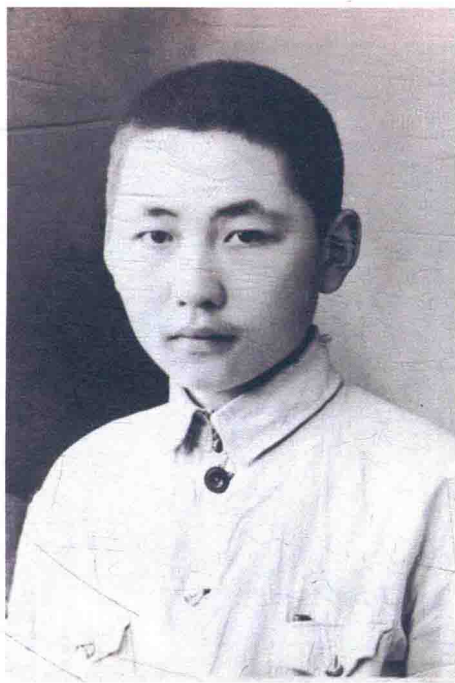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193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0 插页 5
印 数 1—20000
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466-5
定 价 3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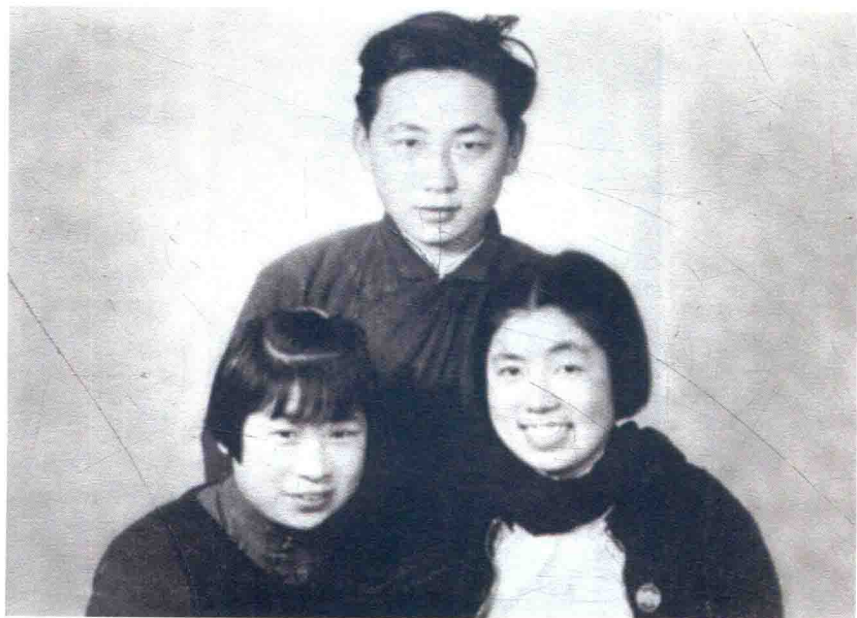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并不是有专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，什么是知识分子，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？关于这一话题，现在讨论的著作已经很多了，不过书本常常只是些理论，并不好拿它来截长补短、按图索骥。特别是像何先生那一代中国读书人，身处万方多难的社会中，成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，好像并不如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。

——葛兆光



1939年初，何兆武在贵阳留影



1941年3月，昆明，与姐姐何兆南、妹妹何兆华合影



1946年春，昆明，离开西南联大前留影



晚年何兆武

修订版序言

何兆武



这本小书《上学记》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。四年前，青年友人文靖女士来找我谈话，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。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，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，只是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。文靖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，居然得到刊载，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，于是又连续和我几度闲谈。就我而言，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，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，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，闲话太多，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，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，已经难以重起炉灶，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，点缀成文。

我想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。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，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，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，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。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，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。而个人的回忆录则恰好相反，它所根据的

全然是个人主观的印象和感受,否则,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。诗人歌德青年时曾热恋绿蒂,甚至于想要自杀,终于写出了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,一泻千里地发抒了自己火炽的热情。及至晚年写自己的回忆录《诗与真》时,他却对自己青年时的热情出之以嘲讽的态度。然则“两般谁幻又谁真?”我以为,两者都是同样的真实,都是诗人自己个人真实的写照。

《上学记》一书出版后,我送给当年同在北京(北平)师大附中读书的一位老同学,当时我们同样经历了卢沟桥事件和中日战争的爆发,也同样对当时政局的内幕一无所知。不过据我当时的印象,宋哲元只是一心想在夹缝之间做他的土皇帝。七月七日卢沟桥开火,几天之内日方就以重兵包围了北京城,而当时的宋哲元却还一味地大谈其什么:“和平、和平,能和就能平,能平就能和。”纯属一派胡言,痴人说梦,不知所云,足可以和阎锡山的哲学(什么“存在就是真理,需要就是合法”之类的混沌逻辑)相媲美。正当他大做其和平美梦的时候,就被日军打了个落花流水,不但北京沦敌,二十九军还牺牲了一个副军长和一个师长。1940年,宋哲元逝世于四川绵阳,临死时还感叹:“这个局面怎么向国家交代?”这是我对他的印象,而我的老同学则认为宋哲元还是抗日的。当然,他也同样地不了解当时的内情,这只不过是个人人的感受。我想,我们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。如果是写回忆录,我们每个人都可以,而且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,至于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,那是学者研究的事情。我们两个人的感受不同,回忆各

异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情,更不妨碍事实的真相。相反,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,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。

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桩,即我对殷福生(海光)学长的印象。有一年顾寿观学长和我同住一个宿舍,殷福生常常跑来和他高谈阔论。我和顾寿观很要好,觉得他忠厚朴实且又好学深思,但对殷福生则印象不佳,总觉得他仿佛是高人一节,褒贬人物毫不留情,尤其在反共这一点上,不愧是一个法西斯。但后来的情况却又大谬不然。他到台湾之后,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,成为台湾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的思想导师,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,致使英年早逝。我对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完全错误的。但是作为回忆录,我以为仍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当时自己的感受。当然,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。

至于书中提到冯(友兰)先生的地方,我不想多做辩白。凡是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人,我想都会一清二楚。邹承鲁院士的学术和人品大概是学术界耳熟能详、一致公认的,他对当时老师的月旦,可谓要言不烦、一语中的(见《科学文化评论》2004年第一卷第一期,第122页)。凡是对当时同学们的诸多壁报还有所记忆的,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大量严厉的批判文字。本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,卢梭的一篇《忏悔录》是千百篇卢梭传记无法望其项背的。为尊者讳、为贤者讳,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。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、与时俱进的,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,让人去顶礼膜拜呢?



以几度私下的闲谈而居然能滥竽于正式出版物之列,未免令我惶恐。许多重要的遗漏,如旧时代学校中的生活,自己思想所受的影响,以及个人对当时学术界的感受和批评,都无法在这里一一补充了,这是要告罪于读者的。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友人文靖女士为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,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曾诚先生,感谢三联书店编辑吴彬女士为此书所承担的那么多意外的麻烦。

2008年2月28日

北京清华园

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

葛兆光

小 引



近十来年里,何兆武先生和我都在清华大学教书,虽然说起来可以算是同事,但因为很早就退休,所以,见面常常是在同去办公室取邮件的时候,或者是在清华园里散步购物的时候。不时收到何先生赠送的新著和新译,不由得感叹他的学术生命力。何先生生于1921年,比我父亲还长一岁,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辈,轻易不敢去打扰。这次,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《上学记》,不知为什么,想起两年前的夏天。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,在病榻上,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,望着天花板,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。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,从福州的家办私塾到官立学堂,从抗战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,到已是“晴朗的天”的南京军政大学,让我觉得,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,

执着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,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,真的是和我们不同,有点儿像精卫填海,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。

现在,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,到云南的西南联大,再回到北京的革大,仿佛那一天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。

一 亲历历史:那一代的人和事

慢慢地看这份珍贵的口述资料,好像随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。

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,又好像很陌生。之所以熟悉,是因为它好像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。何先生求学的时代,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。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事,军阀互相打,国共也在打,日本人打进来,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杀戮场,八年抗战刚刚结束,中国又成了另一个大战场。杜甫说,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,可是,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,简直是连了几十年。不过,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,可历史并不仅仅是“大纲”。正像何先生评论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,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就像“注册组的报告”,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。其实在生活世界里,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,因此,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,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,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。

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,那个时代,不仅有北京从军阀的“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”,有“一二·九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,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,有那个时代中学生“无事乱翻书”的愉快,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。尽管他事后想起来,最好的读书日子,只有“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,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”,但是,就在这一样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三年和流离颠沛的七年中,毕竟他还有读《莎氏乐府本事》、*Gulliver's Travels*(《格列佛游记》)的时候,还有“逃课、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”的时候,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、陈福田、沈从文、钱锺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。也许,那只是历史的细节,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,“细节决定一切”一样,看到历史的细节,常常会反过来,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。

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,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,随着何先生的回忆,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。记得前年夏天,父亲谈起他在闽北山区流亡的暨南大学的生活,对于我,好像就陌生一些。因为毕竟他是学国际贸易的,他身边的那一圈人,我大多不熟悉,只是听他谈起何炳松先生,让我对这个《新史学》的翻译者有一些新印象。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学家,又远比我父亲阅历丰富,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、有民主人士张奚若、有战国派雷海宗、有历史学家吴晗、有哲学史家冯友兰、有逻辑学家金岳霖,有“中国通温德,白俄噶邦福”、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,当然,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印象不同的殷福生(海光),



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。这些我们文史领域的人耳熟能详的学者,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,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,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,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。

让我特别感兴趣的,是在他回忆他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,他和王浩关于“幸福”的讨论。也许,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:

人是为幸福而生的,而不是为不幸而生。王浩喜欢谈人生,就“什么是幸福”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,我也乐得与他交流,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。他几次谈到,幸福不应该仅仅是 pleasure,而应该是 happiness。前者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,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,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。我说,幸福应该是 blessedness(赐福)。《圣经》上有云:“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”可见“福”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,而非物质性的东西。他说,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。我说,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,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,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,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。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,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 T.S.Eliot 的一段话:“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, it is a daily battle. The only end to it, if we live to the end, is holiness. 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.”(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,它每天都在不断

地[与自我]战斗。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,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,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。)他听了非常欣赏。幸福是圣洁,是日高日远的觉悟,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,是一种“durch Leiden, Freunde”(通过苦恼的欢欣),而不是简单的信仰。

据说,何先生与王浩之间有过多次讨论,“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,这一次我说服了他,不禁心里一阵快慰”。那么多年以后,他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论,说明这一观念在何先生心中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。



二 幸福:什么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?

除了这一次和王浩的谈话中,说到“幸福是圣洁,是日高日远的觉悟,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”,把幸福看成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之外,我注意到,何先生在口述自传中,还特别反复郑重地提起“幸福”一词。他说那时他曾想要写一本《幸福论》,他觉得,人是个复杂的动物,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,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,是不是钱越多就越幸福?好像并不是那样,毕竟人所愿望的是幸福,而不仅仅是物质或金钱的满足。在一处他又说:“幸福的条件有两个。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、美好的,可是这又非常模糊,非常朦胧,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。另一方